

论晚清“科学小说”的定名及其影响^{*}

任冬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科学小说”这个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这一名称在中国的流行不仅很大程度上传播了“科学”这个全新的翻译词汇,而且“科学”二字体现的知识权威性充分昭示出文人对于此种小说的重视。在“科学”出现以前,是“格致”这个词基本上指代科学技术的意思,不过却只有“科学小说”,很少看到“格致小说”。通过考察晚清“科学小说”这一名称的由来,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对于科学小说的看法与期待,还有助于我们还原多面而真切的历史场域,从而对中国科幻小说诞生初期的状况有更为丰满具体的认识。

[关键词] 词语 科学 格致 科学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57(2011)03-0073-07

On the Naming and Influence of Scientific Roma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Ren Dongm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name of “Scientific Romance” (Ke Xue Xiao Shuo)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Japan in 20th century.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word “Science”, “Ge Zhi” basically referred to the mea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there was “Scientific Romance”, almost no “Ge Zhi Novel”. By studying the origin of late Qing “Scientific Romance”, we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people’s opin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Scientific Romance”, but also restore the multi-faceted history, and thus have a more spec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earl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Keywords: word; Science; Ge Zhi; Scientific Romance

CLC Numbers: I20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3-8357(2011)03-0073-07

随着中国科幻研究的不断发展与逐渐深入,大多数学者已经知道了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于晚清这一基本史实,不过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晚清科幻与现今科幻在名称上的差异——晚

清时候的科幻小说被称为“科学小说”。对一个事物的命名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命名者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与希望。《论语》有论,“名不正则言不顺”,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名”

收稿日期: 2011-03-29

作者简介: 任冬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 Email: winterhurry@163.com。

^{*} 本文节选自笔者硕士毕业论文《1902-1912: “科学小说”命名及其背后的意义》第1章,有修改,该论文已获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年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的重视。名实关系的论题从中国古代一直绵延至今,而索绪尔提出“能指”、“所指”,则在整个西方掀起人文科学向语言学的转向,因此,分析一个事物名称的由来及其使用背后包含的意图,对我们全面认识这一事物有很大的帮助。

1 汉语“科学”一词的来源

“科学小说”这个词语可以拆分为“科学”和“小说”两部分,其中“科学”是一个外来词汇,它作为对英文“science”的翻译出现于晚清;“小说”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中文词汇,只不过在晚清时期,“小说”的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要探究“科学小说”的起源,首先必须知道“科学”一词是何时出现的。汉语“科学”一词来源于日本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①。日本在幕府和明治维新初期,也是吸收中国文化而使用“格致”、“格物”或“穷理”这类概念用以指称科学技术。据岛尾永康研究,最早在日本使用“科学”概念的是赴荷兰留学回国的西周^②(1829-1897),他在1874年于《明六杂志》第22号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时最先把“science”译为“科学”^③。他把法文中的“science”^④理解为是由一科一科的知识汇集起来的学问总称,把“分科之学”称为科

学。这就把分科的科学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区别开来。他觉得西方的学问跟中国的学问很不一样,认为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文史哲不分的通才之学、博通之学;而西方的学问是一科一科的,比如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等。19世纪后半叶,科学分科的专业化趋势日益加强,伊藤博文在1879年9月呈给日本天皇的教育提案中就出现了“学生必须接受科学教育”这样的话^⑤。从此以后,“科学”一词得以在日本普及。

中文最早出现“科学”一词到底是何时,目前还有争议^⑥。学界共有四种说法:一说是1878年刊登在上海《远东月报》6月号上的文稿^⑦;一说是1896年以前严复的《国计学甲部》(残稿)^{[3] 221-222};一说为1897年冬或次年春,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或者是1898年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⑧;还有一说是1899年王国维的《〈东洋史要〉序》^⑨。“严复说”须待其《国计学甲部》翻译时间确定后方可定论;“康有为说”中《日本书目志》的最早版本已经被毁,今所见版本为辛亥后1912年刻印之万木草堂丛书本,而《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出自《戊戌奏稿》,其中多数为伪稿。据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即为伪稿之一。据大陆学者

①有研究者指出,“科学”是日本人从中国宋代经典中借来用以翻译“science”的二手汉语,其来源是南宋文人陈亮(1143-1194),他曾将“科举之学”简称为“科学”。参见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见《中国学术》第二辑,2000年,第37页,注①。不过据周程、纪秀芳刊登在2009年第4期《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论文《究竟谁在中国最先使用了“科学”一词?》中论证,关于陈亮最先使用“科学”一词的说法值得质疑,似乎是典籍录入时的错误。他们认为最早使用“科学”的是唐末罗衮的《仓部侍郎中墓志铭》。其实不管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中国人是谁,我们可以确定在晚清以前“科学”一词在中文中不仅使用甚少,而且就算出现也是“科举之学”的含义,与“science”无关。

②本名藤原时懋,江户时代后期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启蒙家、教育家。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政治顾问、明治贵族院议员。独逸学协会学校(现独协学园)首任校长。人称周助。

③在英国“science”一词,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系统知识。法国的“science”是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包含在内的。不仅世界各国的科学体制导源于英法两种类型,对科学范围的理解也是英法两种不同的解释并行于世。

④近几年来,关于谁在中文文献中率先使用了“科学”一词,学界莫衷一是,先后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也出现了多篇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分析文章。最近的一篇是周程、纪秀芳二人刊登在2009年第4期《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论文《究竟谁在中国最先使用了“科学”一词?》,该论文对前人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式的梳理与辨析,同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看法。本论文并不会在此对其进行详细的资料分析与考辨,因为单就这一问题已经可以写成一篇硕士论文。在这里笔者只想对当时“科学”一词的传入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描绘,并不需要探究一个确切的时间点。

⑤此种说法由周、纪二人在《究竟谁在中国最先使用了“科学”一词?》一文中提出,但笔者认为论据并不充分,推测成分过多,译文是否为唐廷枢所译都还有待考证,况且如文末论者自己所说:“唐廷枢所使用的‘科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但也不像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那么,唐廷枢为第一个将“科学”一词由日本转介到中国的人的说法应当不成立。

孔祥吉《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考证，黄彰健因为没机会见到清朝大内档案，故在考订推断中时有误会，但他对此篇奏稿是否篡改，因清档整理工作尚未完成，亦无法判断^[9]。如此一来，“康有为说”亦尚待大清档案整理完毕后方可确信。在前两说没定的状态下，“王国维说”虽是证据最确凿的一种说法，不过却无法确认为“时间最早”，还要前两说有了定论之后方可确认。因此，我们可以说的是，大概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科学”一词即从日本传入了中国。

2 “格致”的含义

在“科学”出现以前，是“格致”这个词基本上指代科学技术的意思。当然，“格致”是一个早已存在的经学词汇，最早见于《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汪晖认为，作为“修身之道”的“格物致知”之所以能同近代科学发生联系，其重要的环节在于理学家把这一概念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并同《易传》中的“穷理尽性”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理学方法论的重要范畴，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赋予它以某种相类于认识论的含义^{[3][22]}。就理学范畴而言，“格物致知”论历经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实学”思潮的三种基本形态，其中理学形态和实学形态产生了接近近代科学的可能性。不过，归根到底，他们的思想还是在理学范畴内部的，其意义始终没有脱离道德上的内省，最终方向还是指向人的内心。

最早借用“格致”来指称科学技术的是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说：“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西瓯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其所致

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家者矣。”^[6]徐光启在介绍利玛窦时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而余乃亟传其小者。”^[7]利玛窦的创见在于发现“格致”中穷究事物而获新知的含义，将其与西方的科学技术联系起来，用国人已知的词汇来指代一个全新的概念，使当时的士大夫更容易接受。这只是利玛窦为推行西方科技而采用的一种策略，用拥有至高地位的经学词汇“格致”作为包裹西方科技的外衣，使得一向将科技视为末流小道的士大夫们开始对其重视起来。

到了近代，西方科技开始大举传入中国。冯桂芬（1809–1874）1861年在《采西学议》一文中指出，明末和鸦片战争以后传入中国的西学，“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8][209]}。他主张在广东、上海成立翻译公所，专译西方科技书以教授文童，“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8][210]}。冯桂芬是近代最早将西方科技与“格致”联系起来的人之一。在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后，冯桂芬又主张推广同文馆之法，在上海、广州各设一馆，教习西学。李鸿章接受了冯桂芬的建议，于1863年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奏稿由冯桂芬代笔，上海广方言馆建成以后，李鸿章为该馆正厅所提的匾额即为“格致堂”三字^[9]。这样，西方科技作为“格物至理”的学问重新获得传统“格致”所具有的道德和学问上的地位，为洋务派利用西方科技富国强兵打通了道路，也为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几乎与此同时，来华的传教士也开始重拾“格致”一词，来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与李善兰（1811–1882）于1861年前后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节译为《数理格致》，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范例。就这样，在官场和学术界，“格致”重新获取了指称西方科技的地位。

3 “科学”与“格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一词传入中国以后,“格致”并没有马上消失,很长一段时间里“格致”与“科学”都是并存的。不管是在当时人的论述之中,还是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都是既有“科学”也有“格致”的,以“格致”命名的报刊杂志有《格致益闻汇报》(1898)、《格致新报》(1898)、《启蒙格致报》(1903)等,以“科学”命名的报刊杂志则有《科学世界》(1903)、《科学一斑》(1907)、《科学杂志》(1908)等^[10]。

1902年8月15日,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共6份,该学制虽经颁布,但并未施行。经过修订后,于1904年1月13日,由清廷再次颁布,称《奏定学堂章程》。因颁布时为农历癸卯年,史称“癸卯学制”。该学制规定大学堂中分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8科,“格致科”分为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等6门^{[13] 600-605}。清廷颁布学制,是以政令下达,全国统一实行,由此起到了规范化的作用,这是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得到的。直到1911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章鸿钊(1877-1951)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丁文江(1887-1936),到北京经过考核后还被授予“格致科进士”的称号(当时科举已废除,但仍以举人、进士奖授归国留学生等),章、丁学的都是地质学,确属“格致科”的范围。

虽然“科学”与“格致”在此时段之中并存着,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使用概率上,“格致”一词由于是旧有之词,因而最初使用频率较之“科学”更高,但是,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提高,“科学”开始运用得越来越广泛。这一点在当时报刊杂志的命名上有非常清晰的体现,我们会发现时间越往后,以“科学”命名的报刊杂志

就越多,而以“格致”命名的报刊杂志却逐渐消失。

到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史称“壬子学制”,次年8月,教育部又制定了一些相关章程,与“壬子学制”有所不同,将之综合而成“壬子—癸丑学制”,一直推行到1922年。“壬子—癸丑学制”将“格致科”改称为“理科”,分为数学、星学、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9门^{[11] 654-655}。因此,差不多在1912年以后,“格致”一词基本上淡出了历史舞台,而“科学”的地位愈加巩固起来。

4 “科学小说”的出现

最早出现“科学小说”一词,是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翻译作品《海底旅行》的时候。《海底旅行》被标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从创刊号开始连载,期间曾中途停载,后恢复,前后共刊登二十一回,未完。自第5号第十二、十三回起,《海底旅行》被简化为“科学小说”。第一回作者署为“英国肖鲁士原著,南海卢藉东译意,东越红溪生润文”。

这部小说的原型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的《海底两万里》。不过《海底旅行》依照的译本并非凡尔纳的法文原本,而是日译本。据范苓分析,《海底旅行》对照的日文译本应该是大平三次的《五大洲中海底旅行》^①一书,而在服部诚一为其撰写的“序”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句话:“如硕学者著小说以诱导政治思想,泰西科学小说有以科学之力导人进步的魔力。”^[12]据此可以推测,卢藉东在翻译《海底旅行》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直接根据日译本将其命名为“科学小说”的。因此,不仅“科学”一词源自日本,“科学小说”一词同样来源于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日译本参照的也并非法文原本,而是英译本。所以《海底旅行》一书经

① (日)大平三次译、服部诚一校阅,明治17年(1884年)由日本四通社出版。

历了法文→英文→日文→中文这样一个转译过程，可以说当时凡尔纳的很多小说（或其他非英语文学）传入中国的途径都是这样的。那时的英语中还没有出现 Science Fiction 一词，这个被后世公认的科幻小说的代名词是由美国当代科幻创始人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 1884-1967）提出的。1926年，他在自己创办的科幻杂志《惊奇故事》第一期中使用了 Scientifiction 一词，后来这个词逐渐演变为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 Science Fiction。19世纪末20世纪初，凡尔纳和威尔斯等人的小说在英文中一般被称为 Scientific Romance，因此日文的“科学小说”一词应该是对 Scientific Romance 的翻译。

在此之前，梁启超已经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8月18日）上登载过一篇文章《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将小说分为10种：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割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其中说明“哲理科学小说”为“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其取材皆出于译本”，接下来举出了几种译本：《共和国》（希腊大哲柏拉图著）、《华严界》（英国德麻摩里著）、《新社会》（日本矢野文雄著）、《世界未来记》（法国埃留著）、《月世界一周》、《空中旅行》、《海底旅行》。由此可以看出，在梁启超那里“哲理科学小说”基本上应该分为“哲理小说”和“科学小说”两类，在《新小说》的实际编排中，也的确做了这样的区分。但毕竟此时出现的还是“哲理”与“科学”并用的“哲理科学小说”一词，所以“科学小说”真正作为一个专门的名词出现，还应该是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翻译作品《海底旅行》的时候。此后，许多杂志沿用了“科学小说”的栏目，国人自己也开始尝试创作“科学小说”，关于“科学小说”的理论论述逐渐增多。

5 “科学小说”还是“格致小说”

前文已经论述过“科学”与“格致”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何是“科学小说”，却不是“格致小说”？在1902年到1912年之间，“格致”和“科学”在中国的大地上并存着，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含义是可以互换的，而很多人在使用时也并未特意对他们加以区分。在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格致学沿革考略》中，“科学”和“格致”就同时出现，两个词语的含义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而周树奎（周桂笙）在《〈神女再世奇缘〉自序》（1905）中则有“科学不明，格致不讲，宜乎儒者于本国经史之外，几不复知有学矣”^[3]的说法，将“科学”和“格致”并置一处；还有例如棣（黄小配）在《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1907）中有论：“顾如《镜花缘》之博，则地理、哲学与格致之影响也；《列国志》之精，中如阴符游说，则科学之滥觞也。”^[4]他们几乎都把这两个词语当作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在使用。

但是，整个晚清时期，基本上只有“科学小说”的提法，却很少看到“格致小说”。目前，笔者找到的唯一一篇标明“格致小说”的小说，是刊登在第160号《图画日报》上的《爱里斯》^①。小说讲述的内容是：一个名叫爱里斯的美国大资本家，中年丧妻，想要再娶，其子女恐多出一些分家产的人，因而托辞节欲爱亲之道不许爱里斯续弦，于是爱里斯在家中养一猛犬，训练它专咬女儿的男友，以此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会发现，这篇小说的内容和科学几乎毫无关系，倒是更偏向于道德层面的说教。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格致”在朱熹那里的含义，为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5]的道德境界，“乃明德之要”。这里的“格致”仍属一种心功夫，乃从人心已知之理如慈孝、不忍之心等，推广到未知境遇中去，是正心诚意、明明德、止至善的基本方法。小说强调的恐怕还是一种伦理道德上的秩序，希

① 《图画日报》于1909年8月16日创刊，由上海环球社编辑部出版。《爱里斯》，见《图画日报》第160号第5页，作者：香，标“格致小说”。

望子女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

为什么“科学小说”大行其道却几乎没有“格致小说”流行?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科学小说”这种文类本来最初就是从日本引进的,翻译进来时受译本的影响,译者所定的名称即为“科学小说”;更重要原因还在于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译者或作者已经不想用“格致小说”这个名称去命名这类型的小说了。说到底“格致”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科学的意思。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格致”最本质的含义“格去物欲、诚意正心”会一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使用它的人们,这与西方“科学”强调的客观性、实证性完全不同。当初传教士们利用“格致”来指代“科学”,只是对中国传统思维的一种迁就,它不可能使中国人对科学的真实涵义有更明晰的了解。因此,某种程度上说,“格致”一词的使用,妨碍了科学进一步的引入和科学研究的开展。我国虽然从明末就接触到西方科学,但吸收却非常迟缓,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同化性的认识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晚清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格致与西方科学技术之间的不同,如张之洞就说:“《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10];严复在其著作中提到“science”时也是用的“西学格致”一词,而不是简单地采用易与儒家经典相混淆的“格致”。正是因为发现了两者的区别,清末的时候,国人才会从日本引入全新的“科学”一词,并逐渐取代了“格致”。

当提到“格致”的时候,大多数国人脑中首先出现的恐怕还是它的经学含义,“科学技术”只是作为在原有基础上引申之后的附加含义;而“科学”作为一个全新的词,不会有传统文化的羁绊在里面,国人必须从头开始去理解这个词,当提到“科学”的时候,国人对这个词的心理反应必定是“新奇的”、“西方化的”。进一步说,从词源上分析,“科”是从知识分类即“专门之学”的意义上演化而来的,而“学”则更具有一种“知识体系”的权

威性。因此,为了强调“科学小说”是一种全新的从西方传来的文类,这种小说就必定会被命名为“科学小说”而非“格致小说”了。

6 结语

晚清“科学小说”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这一名称在中国的流行不仅很大程度上传播了“科学”这个全新的翻译词汇,而且“科学”二字体现的知识权威性充分昭示出文人对于此种小说的看重。不过,“科学小说”的定名一方面肯定了这一小说类型的异域性,这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向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种类,是一个舶来品;另一方面却也为该种小说的发展埋下了一个隐患——“科学小说”必定强调其中包含的“科学知识”,但“科学”又是一个外来词汇,读者在好奇之余只能通过阅读这类小说来理解“科学”的含义,问题是在没有接触到真正的科学实验或者接受完整的科学体制化教育以前,晚清的译者和作者本身就无法理解“科学”的真义,更遑论读者了。在这样一个矛盾之下,“科学小说”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始终崎岖不平,它的初衷和它达到的实际效果之间差距甚远。回望中国科幻文学百年发展史,晚清“科学小说”定名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篇章,它让我们看清中国科幻小说在发展初期的境况,其中的得失利弊也是对我们当下科幻的一种警醒。

参考文献

- [1] 岛尾永康. 汉语科技词汇的中日交流与比较[C]// 第三届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论文, 1984. 樊洪业. 从“格致”到“科学”.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8 (3).
- [2] 樊洪业. 从“格致”到“科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8 (3).
- [3] 汪晖. 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M]// 汪晖自选集.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21-222.
- [4] 朱发建. 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6(2).
- [5] 孔祥吉. 戊戌维新运动新探[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81-83.

- [6] 利玛窦. 译几何原本引[M]//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59.
- [7] 徐光启. 刻几何原本序[M]//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58.
- [8]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209, 210.
- [9] 万国公报. 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四册[J]// 台湾: 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68: 2139. 胡思庸.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 近代史研究, 1985 (6).
- [10] 叶再生.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第一卷)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 929-930.
- [11]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600-605, 654-655.
- [12] 范苓. 明治“科学小说热”与晚清翻译——《海底旅行》中日译本分析[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3).
- [13] 周树奎. 《神女再世奇缘》自序 [J]. 新小说, 1905 (22).
- [14] 棣. 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 [M]// 中外小说林, 1907(13). 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一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40.
- [15] 钱穆. 朱子新学案 (中)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7: 707.
- [16] 张之洞. 劝学篇·会通第十三[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159.

新闻快递

科普创作培训班在京举办

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共同举办的“科普创作培训班”(第1期)6月3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热心科普创作的40余名离退休科技人员参加了培训。

中国科学院应用研究与发展局高级工程师、退休后才从事科普创作的王宁寰以题为《第一次鲜花, 永远鲜艳》的报告作为本次培训的开篇, 生动地讲述了自己走上科普创作道路的历程, 并畅谈了“以故事开头”、“逆向写作思维”、“作品要让人有兴趣、爱听、有收获”等体会。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汤寿根结合自己丰富的科普创作实践, 主要从理论上概述了科普作品的三要素, 即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主任石顺科主要围绕科普创作的缘起、意义和机制, 总结、介绍了国际、国内开展科普的情况和环境, 当前我国在开展科普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科技日报》原副总编王直华重点讲述了科普创作基础中的构思、对象、故事、感动、修改五项内容, 及他的格言式的写作经验和选题途径。

《大众科技报》总编助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尹传红以《科普创作的准备、起步和提升》为题, 总结了自己从社会热点找选题、抓题材的经验, 收集信息和整理资料的方法, 并以丰富的实例阐述了科普创作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科普作家焦国力围绕“科普创作的文学表述”, 畅谈了自己在创作实践中的几点体会, 并总结出“科普创作三字经”与大家交流。

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颜实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普创作、出版的情况和问题, 发达国家科普创作、出版的发展趋势, 并对科普创作方式、科普作品的基本要求等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大众科技报》 柯 祚)